

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农民工

社会支持系统的策略选择

● 张文霞 魏爱棠

内容摘要 本文讨论了目前在中国专业社会工作与实际社会服务系统相分离的状况下,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的有关策略问题。

关键词 社会工作介入 农民工 社会支持 策略

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风潮。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流动人口已超过1.2亿,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农民工。他们长期驻留在城市尤其是各大城市,成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2002年北京外来人口调查数据显示,仅北京一地,15~39岁人口中外来者就占79.8%。2002年底,广东省佛山市外来务工者达到204.25万人,其中青年占85%以上。据有关专家估计,进城务工青年对广东省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以上(中国国家统计局,2002;北京市统计局,2003;共青团佛山市委员会,2003)。

但是,尽管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过了20年,许多城市中的打工青年也从一个个毛头小伙或年轻姑娘变成父亲或母亲,但他们作为城市社会中庞大的社会群体,

大部分还依然游离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性社会支持之外,整体处于社会支持严重缺失的境地。这种状况的持续使得我国城市社会不断积聚潜在的社会危机。近年来,各大中城市外来流动人口尤其是外来青少年犯罪成为主流,比例居高不下,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危机的严重性。据有关资料显示,沿海城市厦门2002年查获的违法犯罪嫌疑人中,外来流动人口占了76%,其中多数是文盲、半文盲的中青年农民、无业人员。2001年上半年度,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起诉的青少年犯罪案件中,嫌疑人全部为外来人员。并且,外来青少年犯的再犯比率高达31%强,他们在受处罚后,由于没有得到有力的监管和帮助,再次游荡而走上犯罪道路(2002年厦门外来人口报告;戴松毅,2002年)。

近年来,在某市出租车司机中还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18岁的农村青年,怀揣着

父母辛苦积攒的几百元钱来到城市,梦想着能找到一个工作。可是半个月过去了,工作还毫无着落。那一天,这个小伙子兜里只剩下两块钱,他不敢吃饭,只好饿着肚子走啊走,走了一整天。他先后找了两家汽车修理厂,请求老板能给他一个工作,只要管饭就行,可是没有一家缺少人手。绝望中,小伙子在夜幕中登上了一辆出租车,车到中途,他试图抢劫司机,被司机拒绝后,就残忍地杀害了司机。

这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外出打工青年的一种典型遭遇:满怀梦想来到城市却发现现实与梦想差距遥远,极易陷入生活危机却不知如何或不足以应付危机,急需社会帮助却发现城里举目无亲。加之自尊心较强而意志力薄弱,一些人在困境或教唆、冲动之下极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以上情形暴露出我国城市社会中存在的一个严峻社会事

实:城市农民工,尽管上至政府下至社会都认可他们是现行体制中不折不扣的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他们实质上被置于社会支持极度缺失的境地。这种状况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它昭示了目前外来青少年犯罪急剧恶化的社会学逻辑。

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为农民工提供社会支持和制度保障的重要性。温家宝总理一直十分关心农民工的欠薪问题,学术界和媒体也一再呼吁要给农民工市民待遇,各级政府部门也都在努力采取种种措施解决农民工的子女就学、工资拖欠、福利保障等问题。应该说,中国已经开始从决策和制度层面正视并致力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然而,能否让这些制度性的社会支持真正发挥效能,却是在构建正式支持系统过程中一个最值得关心的问题。因为诸多问题不仅是由于针对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的整体制度安排的缺位所造成的,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在提供某些实际社会支持的过程中缺乏专业服务而导致支持效能流失。因而,如何使我国现有的或将来更为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的传递过程更有绩效,更能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鉴于此,作为以专业手法提供社会福利服务见长的社会工作应当介入城市打工青年群体的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和传递过程,以提高现有社会支持系统的绩效,促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立足于现阶段我国特定的社会福利状况,社会工作

者对城市打工青年群体的社会支持系统的介入策略应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主动介入基层社会服务组织,依托现有基层服务组织逐步培育专业的社会服务中介机构;在介入中应着重强调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和专业内涵的传播和内化;以专业实习为平台,构筑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社会服务实务的合作互补关系;发展多个层次互补的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的策略之一——社会工作应主动介入基层社会服务组织,依托基层社会服务组织逐步培育专业的社会服务中介机构。

随着我国“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职能改革和社会福利服务的社会化,我国社会福利服务的组织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单位”不再承担传递社会福利服务的责任,因此需要建立能够替代“单位”承载、传递社会福利功能的社会化组织网络。然而,由于中国的社会福利改革采取渐进策略,当前我国社会服务的组织模式明显地反映出对原有制度和经验的路径依赖,社区居委会以其遍布基层的组织网络和较低的运行成本等优势而成为新型社会福利网络的基础。但是,从总体上说,在现行的福利服务提供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行政性、非专业性、缺乏福利服务的激情、社会福利服务价值理念模糊、方法和技巧不足等问题(王思斌,2001;孙莹,1997;李培林,2001)。笔者曾在一个针对居委会干部的社区工作者培训班上就“对于一个曾有偏差行为、目前正陷于困境的

外来打工青年是否应该实施社会救助”这一问题做过一次专题讨论,仅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认为应该施助,绝大多数人认为社区的福利服务不应包括外来人口,他们尤其认为对这类外来打工青年的救助根本上就是助长外来人口犯罪,应该由城市治安管理部门而不是社区承担对这类人的管理责任,或者就让他们找老乡帮忙(魏爱棠,2003)。应该说,这种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

事实上,在城市社区服务中,几乎所有的社区服务都是以是否为常住户口为设限原则,外来人口基本上是被排除在福利服务的范围之外(唯一超越人群边界的实际服务是计划生育)。当然,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城乡二元社会管理体制的影响、有城市福利支出的实际困难、有社会福利服务人员的短缺等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福利服务社会化是在没有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前提下,由政府依靠原有的组织机构自上而下推动形成的,从事福利服务的人员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没有树立起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根据政府的安排,而不是从社区的实际需要出发制订相关的服务计划。

另一方面,由于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传播走的是一条学院化的道路,它是通过学校教育过程达到推介社会服务的主张和方法的。中国当前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多是社会工作教育者而非社会工作实践者,他们对社会工作强调更多的是国际通则,基本上是通过展示国际社会发展

成果来影响政府和社会,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福利服务现状虽有关关注,但了解不深,介入不多。尤其是作为教育者的身份,许多人受高校现行评聘体系的限制,真正投入实务工作不多。因此,在中国福利服务社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专业社会工作与实际社会福利服务相分离的现象(孙莹,1997)。

时至今日,随着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张力膨胀和社会问题的严峻化,社会福利服务的内容越来越复杂,福利服务的规范化要求逐渐提高,社会福利服务部门对专业知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需求。专业社会工作应借此机遇主动介入实际的社会服务机构,抓住社区工作者进行专业化、职业化和职能转变的时机,在立足于互补双赢的基础上,构筑学校与社会服务机构之间平等合作的平台,并为其提供智力和人力的支持,共同探索缓解社会张力的方法。

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的策略之二——社会工作对社会服务传递过程的介入应该强调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和专业内涵的介入。

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色就在于其对价值理念和专业内涵的强调,而这恰恰是中国福利服务社会化初期所欠缺的,是其进一步寻求的“软件”建设所需要的内容。

首先,在对农民工服务方面,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念能够很好地消除城市社会服务人员对外来人口的偏见,提高其为外来人口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积极性。目前城市外来打工青年社会支持网络的缺失,一方面是由于政府

社会政策支持的缺失,另一方面则是从事社会服务的机构及其人员对外来打工青年的忽视或者说蔑视造成的。由于传统行政性工作方式的影响,城市许多从事社会服务的机构及其人员常常习惯性地把自己和外来人口之间的关系定位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更多地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审视外来人口与居住城市、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以及外来人口与自身工作之间的关系,这使他们感受到的是外来人口所带来的大量麻烦而非外来人口在城市生活中的困难,使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外来人口淡化出自己的服务视野。而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念能够帮助社会服务机构及其人员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念,引导社会服务相关机构及其人员重新定位其职责。

其次,注重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专业内涵的介入,能够很好地弥补现有社会服务机构提供服务内容和服务方法上的不足。目前我国发展的社会福利服务主要是“温饱型”的服务,关注的是物质需要的供给,对提供过程不强调技术和方法,不强调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尊重,因此对服务人员素质的要求不高(孙莹,1997)。而在对农民工的服务中,传统的服务方式直接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其他群体间的文化差异。农民工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使他们成为城市生活中独特的一个群体,如何与他们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将极大地影响着服务的有效提供。二是农民工对精神支持的需要。李培林在调查流动民工城市生活遇到的最大困难时发现,除

了约有35.4%的人同城市居民一样提到经济问题“物价太贵”,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社会关系少,感情孤独”,约占24.5%,这是极富民工特点的。并且调查还发现,收入越低的流动民工感受到的“社会关系少,感情孤独”的困难越大,女性比男性的感受更明显(李培林,2003)。从中可以看出,外来打工青年对精神支持的需要是相当强烈的。社会工作的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方法能够很好地帮助打工青年适应城市生活,理解和解决城市生活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情况,给予打工青年情绪方面的支持和专业的指导,能够策动社区资源,帮助打工青年在老乡之外甚至在不同群体之间构筑城市生活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提高其获取资源的能力,增加其解决问题的机会。

再次,注重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与专业内涵的介入,有助于提升社会服务机构整体的服务目标和服务品质。专业社会工作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往往充当支持者、倡导者和资源中介人的角色,强调关注受助人的多方位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社会工作者要主动帮助受助人获取所需要的资源。这种观念有助于改变服务人员被动传递福利资源的现状,提高其满足多元社会需要的服务能力;有利于发掘和聚合社会资源,促使基层社会服务机构真正发挥社会福利服务中介组织的作用,集结多方力量为外来打工青年提供法律咨询、劳工权益保护、领袖培养、紧急救助、信息咨询等方面的社会支持。

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的策略之三——

以专业实习为平台,构筑高校社会工作教育与社会服务实务的合作互补关系,发展青年农民工社会工作。

如前所述,代表专业社会工作的高校社会工作教育者应该主动与从事实际社会服务的机构结合,建立长期密切的共建关系。这一共建关系的核心环节应是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专业实习与社会实践。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以价值为本的专业,专业实习在其课程训练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弱势群体、了解社会服务机构、催化理论知识与技巧、内化专业价值观的机会(曾华源,1995)。因此,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应该重视专业实习活动,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尤其是目前从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教师大多来自其他专业的状况下,接触实务工作,实际应用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技术,对于教师本身也同样重要。基层的社会服务机构恰恰为社会工作的专业实习提供了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舞台。

在这一关系中,社会工作专业的师生既是合作的一方也是学习者。尽管中国现有的社会服务机构都只是半专业甚至非专业的,但是应该承认,那些长期从事基层服务的工作人员相当熟悉工作对象的状况,他们从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沟通、交往和解决问题的经验,他们为弥补社会政策缺失作出了不少的创新,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际社会工作经验,是值得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者学习、借鉴和研究的。社会工作在中国基层社会服务机构开展专业实习,应

该本着肯定机构的工作价值、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尊重他们的现实需要的立场,在其基本的工作架构内,做他们想做却无法做或无力做的服务。只有以己之长补其之短,才能让其看到合作的价值,才能激发其维持并促进合作关系的积极性。

事实上,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也普遍希望根据居民需要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因为这有利于改善他们的社会形象,发展他们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够增进居民对其工作价值的认可,也能减轻他们在社会管理上的负担。但是,由于他们实际上仍旧承担着大量行政性事务,使他们根本无力投入太多精力从事实实在在的社会服务。

现在摆在社会工作专业实习面前的问题,不再是过去无人愿意接纳的尴尬,而是以目前的能力,社会工作专业的师生能否长期持续地承担起这块服务的主要责任,能否以自己的服务展示专业价值。特别是外来青年农民工的服务,对象情况异常复杂,国内少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模仿,整个服务的过程、服务的形式都需要探索,对于缺乏相关实务经验的社会工作专业师生来说,这除了是一个极好的锻炼,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对以专业实习介入外来人口服务的教育者和实习生而言,强调行动和实践研究是必要的,同时也能使社会工作的研究建立在实务过程中遭遇的“问题”的基础上。实际上,现在关注外来民工问题的理论研究很多,中国从事实际社会服务的民政、工、青、妇群团和社区部门都开始对外

来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问题有所意识,但无论哪一方面能够投入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如何发挥社会工作的作用,达到整合这些自成条块的资源和力量以为青年农民工服务,确实需要结合实际的行动研究作为工作的指导。行动研究指导介入,不仅在于整合理论与实践,更在于从行动中发现、研究问题,创造出有效的行动方案。

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的策略之四——发展多个层次互补的社会支持网络。

根据外来打工者的人口和工作特点,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以采取社会支持网络的工作模式。这种模式以对整个网络的介入为目标,综合考虑需要支持的个人和能够提供支持的相关人员以及资源。在介入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不仅要关注打工青年,更应该关注与其发生联系的整个社会支持网络;不但要引导工作对象挖掘和利用其拥有的支持资源,而且要推动其积极拓展和再建构社会支持网络;不但要帮助打工青年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且更应该推动其利用和拓展社会支持网络的能力建设。把这种工作理念运用于社会工作实践,我们尝试提出一种以社区为平台,从个人、小组、社区多个层面展开介入的网络化模式(张文霞等,2004)。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包括:

1. 强化个人网络的功能。这种策略重点在于强化服务对象现有的人际关系及其所处环境当中有发展潜力的成员的互助能力。可以采取的方式有“亲友发展计划”、社区咨询中心计划等。

2. 推进以小组层面的介入。

本期特稿

即通过社会工作的小组工作方法,拓展外来打工者的互助网络,通过治疗性小组、发展性小组、娱乐性小组等把面对共同问题或具有相似兴趣或能力的人聚合在一起,促进其互相支持。在小组工作中,社会工作者需要扮演协调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充分发挥打工青年中“志愿者”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不仅服务对象可以得到帮助,而且对于服务他人的义工,也可以令他们感受到自身的能力和价值。

3.通过社区层面的介入推动社区发展和社区计划。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社区、开展社区工作中有两种取向:社区发展取向和社会计划取向。社区发展取向是指通过社区活动的开展,使得个人和社区都从中有所获益。社会计划取向是社区工作中一种“由上至下”的工作模式。它侧重在政策层面增进服务对象的福利,即通过对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政策加以批判、向有关政策制订者和政策实施者争取合法权益,达到为服务对象增权的目的。但是这一工作取向必须以在取得政府部门的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所以,社会工作者在介入时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包括推动某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观念的转变。

总之,把这种支持网络的理念运用于社会工作实践,可以发展出许多工作内容,比如就如何维权、如何求助、互相关爱、遵纪守法、奉献社会等在外来青年中开展教育和讨论,进行相关团体活动等。在组织方式上,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培养和依靠领袖和自愿者,引导他们自我组织、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活动。

结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青年社会工作体系

以上讨论了在目前中国专业社会工作与实际社会服务系统相分离的状况下,社会工作介入青年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的策略。但是,策略最终是为目标服务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以开展专业的青年农民工社会工作为契机,完善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青年社会工作体系。该体系以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为城市青少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发展和充分利用社会支持网络为主导工作模式,以将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方法以及社会工作者的资源引入服务过程,并提高社区组织(特别是居委会)作为资源中介者和整合者的主体角色和主动性为基本途径,以提高资源传递的有效性为目前工作的重要环节。简而言之,我国的社会福利资源应该打破机构界限成为一个融为一体的网络,促进所有青年包括城市打工青年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2002 厦门外来人口报告:《关注城市中“流动”的人群》,人口世界网,2003年5月12日。
- 2.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北京市统计信息网,2003年2月1日。□
- 3.戴松毅:《思明区青少年犯罪之新考察》,人民网,2002年4月18日。

4.共青团佛山市委员会:《加强外来青工教育管理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佛山外来务工青年基本状况调查报告》,载《政协佛山市九届一次会议大会发言材料》,2003年5月。

5.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交往方式》,中国网,2003年6月20日。

6.李培林:《社会生活支持网络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载《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7.孙莹:《试析我国社区服务和专业社会工作的分离与组合》,载《中国社会工作》,1997年第5期。

8.王思斌:《我国社会工作在转型社会中的社会责任》,载《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工作——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2001年会论文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魏爱棠:《厦门市湖里区社区工作者培训班课堂讨论资料》,2003年。(未发表)

10.曾华源:《社会工作实习教学——原理及实务》,台湾师大书苑有限公司印行,1995年版。

11.张文霞、朱东亮、邓鑫:《外来打工青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与社会工作的介入》,载《中国青年研究》,2004年9月。

12.中国国家统计局:《全国跨省流动人口超过4000万》,载《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附件》,2002年9月9日。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厦门大学)

■ 责编 唐浩夫 T:010-88363163 E-mail:wcnmin99@sina.com